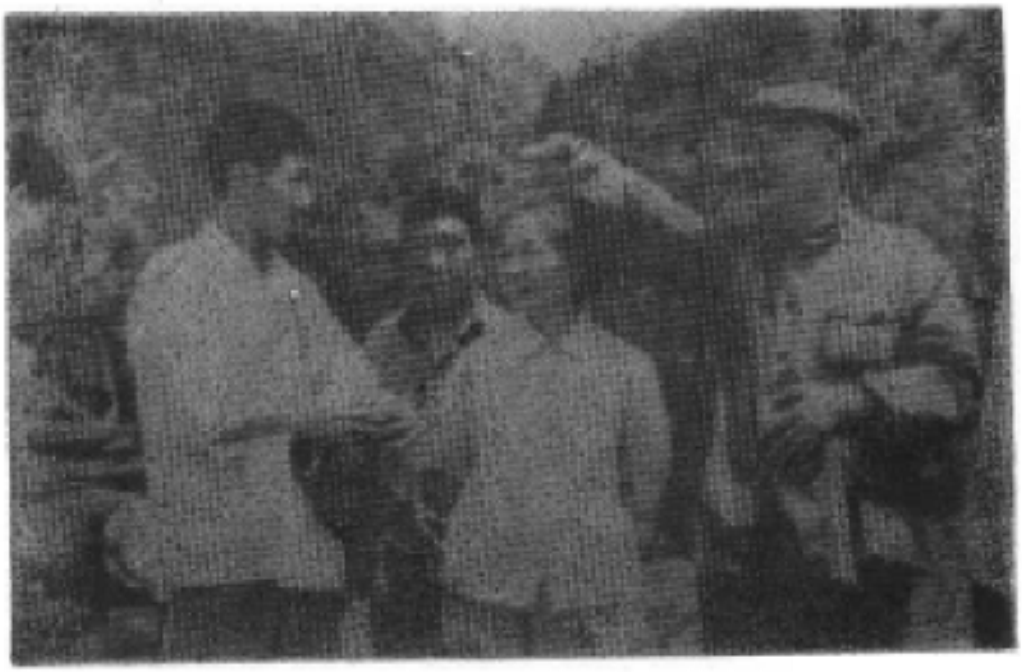


国家主席李先念向张执一同志遗体告别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挽张执一同志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0年张执一同志重访大别山老根据地留影

(右)张执一　(中)王曦　(左)老根据地干部



张执一同志与夫人王曦合影

汉阳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我的青少年时代……张执一遗作（1）
张执一年表……王曦供稿（20）
思　念……王曦（23）
鄂北统战策马汉阳龙潜黄埔
——记念张执一同志逝世五周年……孙耀华（36）
沿着历史足迹寻回的往事
——纪念张执一同志和我相处的日子……张斧（43）
难忘的言行
——记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李国友（49）
张执一指挥的汉阳南乡之战……刘文煊（51）
张执一在武汉的历史足迹……郑桓武（57）
张执一同志轶事……龙从庶（65）

怀念集
一门忠烈的徐质夫……李家彬　郑忠银（68）
应留碧血照丰碑
——记吴干臣烈士英勇事迹……止戈（72）
仰望楚天吊忠魂
——记张宝珍烈士壮烈献身……木亘（81）
万流一同志的一生……周选堂（89）

海峡
蒋纬国先生同我相交的几件往事…刘绍邦（98）
遥望台岛怀梁叔……肖伯阶（100）

两岸
老友艾时生平……郑桓武（104）
无限哀思寄海隅
——忆先父孙必亨……孙涛（107）

革命历史
汉阳农运大事记……李家彬（111）
曹家砚谈黄陵地区农运…高士界　张义勇（123）
我在汉阳革命活动的二三事……张天晖（127）

回忆录
八十忆往……杨春波（135）
抗战时期侏儒见闻……尹明阶（156）

地方名人
湖北煤矿资源的开拓者高寿林……秦思贤（174）
忆先父张纯一……张保元（176）
县参议会议长邬耀墀……陆久闻（180）
先父甘幼之在教育生涯……甘学余（182）
我知道的甘幼之先生……李蔚青（185）
书画家王南舟……匡陕阳（188）
大医精诚　杏林生晖
——记名老中医黄云樵……周选堂（190）
探讨伤寒证的李培生……周昂唐（193）

工商人物画廊
辛亥首义前后汉阳工商界人士……杨慧卿（196）
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在汉始末……彭翰翔（200）
爱国实业家张松樵……环　宇（206）

教育史
西南联大学潮始末……刘杰三（218）
解放前汉阳的私学……余啸东（227）
正本小学纪略……高士英（230）

汉阳
汉阳县古文化分布浅述……高　古（233）
普化善堂的兴废……杨昌铸（235）

风土
新邦的传说……许楚樵（239）
太白湖之藻水稷……郭先藻（241）
血吸虫流行与危害……陈顺安（243）

小诗小史

琴台怀古……蒋天曙遗作（249）
赠妻……曹志坚遗作（249）
悼万流一同志……张执一遗作（250）
答友人书……万流一遗作（250）
秋日感事寄汉阳旧友……肖抱真遗作（251）
留得英名百世荣（忆肖毓福同志）……肖文安（252）
沦没营生虎口下……余季雅遗作（253）
遇医感怀……艾毓英遗作（254）
答友人刘教授……黄六巍（254）
赠张执一二首……周显唐（255）

补白几则

尉武山……莫　邑（ 46 ）
大小军山……川　流（ 97 ）
代巍蔡锷……晴　川（103）
古今战争瞎计……文　摘（106）
巍张业广先生……石　流（122）
元宵观珠……浩　瀚（24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的青少年时代

张执一遗作

“交代”或“交待”，本是旧时代前任与后任官员办理移交手续的用辞，进而亦有把意见或事情向有关人员说明、嘱咐的意思，可谓无甚褒或贬的含义。可是“十年浩劫中”，这一辞语却被一些“造反派”用作对我们这些久经南征北战、驰骋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斗争在敌人的法庭、监牢，历尽了风霜雨雪幸存下来的革命老一辈人，进行人身侮辱的专用辞。他们把一般人所讲述的往事，或对某件事的“揭露”或“交待”称为“证明”或“检举”；把我们这些被他们视为“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或“蜕化变质分子”对事情真象和历史事实所作的说明，则称为“交代”或“交待”。开始，每当我的耳鼓响起这一字眼时，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些“造反派”的丑恶嘴脸，油然而生作呕之感。久而久之，才习惯下来。且自喜由于这一专用辞，使我们有别于那批野心家。因此，我自家第一次自题用“交代”一辞，在它的下面，写出自己身家的情况和政治斗争与思想改造的历史，向我的后辈、后世人、作出坦白“交代”或“交待”，用以说明老一辈革命者是怎样选择人生道路，怎样坚定不移、执一不二地追寻党，跟着中国共产党前进，在艰难困苦中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凭栏怅望天犹

夜，唯见晨星已指东”（《行踪吟草·千里长航》），在漫漫长夜，中国人民跟定中国共产党这颗北斗、这轮旭日，才获得了翻身解放，中国才走向繁荣富强。新中国是美丽的，我在一九五四年写的一首诗里说：“旧时潦草芦藜地，今日黄金鱼米乡。血汗换来新世界，谁能回首等闲忘。”（《行踪吟草·湖山新貌》）这黄金鱼米之乡的新世界，是前辈人用鲜血、用汗水换来的，是不应当忘记的。

一、可爱的家乡

农历辛亥年四月初五（公元1911年5月5日），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汉附近汉阳县麦(Zha渣）山南麓樊里堡所属的小屠家湾。原名谨唐，一九二八年到武昌读书改名张忍，因工作关系，用过一些化名，随时更换，并无固定。一九三五年从国民党监狱获释之后，为了表示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执着不渝，才改名“执一”。

汉阳县的得名，是在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那时的县治还在现在蔡甸附近的临嶂山（临嶂山、城头山）下，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才把汉阳县治由临嶂山移到汉水南龟山脚下。据《史记》记载，汉阳在周朝时是封给汉南诸姬的，后被楚所灭。汉阳地处江汉汇合之所，形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次大战，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末年，楚国贵族伍子胥替父报仇，率吴国的军队与楚军大战于龟山（现属汉阳）、小别山（又名甑山，现属汉川）一带。三国时这一带属于吴地，世传鲁肃曾在麦山屯兵，故麦山又名鲁肃山。山南麓有一块平地，上有一平台，相传为鲁肃的点将台；距此二华里曾有麦山寺，因内供鲁肃像，又名鲁肃庙，今人称之为“连环堡”，传说鲁肃在这里摆过连环阵，因此得名。大别山（又名鲁山，现属汉阳）西麓也曾有鲁肃祠和鲁肃墓。相传黄祖、黄

操、孙权等军阀势力在这一带打了几十年仗。两晋南北朝前后二百余年，这一带也不断发生战争。南宋与金对峙的百来年中，汉阳多次遭到金兵侵掠；岳飞曾以城头山作为抗金根据地，并从这里出发收复了襄阳、南阳、信阳等失地。南宋与元对峙的四十年中，在汉阳一带发生过几次争夺战。明末汉阳等地遭左良玉官兵的蹂躏；清初统治者为了征服川鄂抗清力量，又在这里进行了几十年战争。频繁的战乱，严重阻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家乡的人民带来了说不尽的灾难。据陆游的《入蜀记》说，他乘小舟经东荆河（即今沌水）到荆州，两地两岸绿草，荒无人烟，非常之荒凉。几百年后，那里早已人烟稠密，围着蓼山四周的湖汊（汉阳境内有不少湖汊、大的有小蓼湖、马沧湖、索子长湖）都是密集的村庄。

汉阳的鹦鹉洲，相传是东汉末年黄祖杀弥衡处。弥衡著《鹦鹉赋》，所以人们便把他遇害的地方称为鹦鹉洲了。鹦鹉洲原属江夏，后沦于江，在汉阳西生洲。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江夏白沙洲为水所没，鹦鹉洲归属汉阳。从鹦鹉洲西行三十里到沌口，逆沌水而上又三十里抵黄（皇）陵矶，西北向十五里就是我的家乡。走北路可以从汉阳入汉水六十里到蔡甸，向南三十里就是蓼山。

“蓼”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蓼山，当地人、周围人都不知道。蓼山东西有二十华里，南北有六七华里，最高峰约二三百米，东端有一个比较大的集市，名叫蓼山集。整个南乡周围纵横约一百公里，处于长江、襄河三角洲的尖部。那儿的山，有岗岭子；水，有湖汊子。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丘陵地带，山水相依，湖光与山色相映，格外让人喜爱。气候湿润温和，山间平地辟为水田，土岗丘陵开成旱地。水田植稻，旱地种麦、棉，间点蔬豆，都是一年两熟。家乡有约数千亩的水面，名小蓼湖，湖形弯曲，形似刀环，东通南

湖，盛产鱼虾菱藕，湖边芦苇丛生，湖心碧波荡漾。人民朴实而知礼让，自古以来非耕则渔，很少有经营商业的。春夏力农，秋冬业渔，妇女市居多事剪彩，乡居惟勤纺绩。家家有纺线车、织布机。汉阳的白布、紫花布、格子布、线布等，行销远近。

我爱我的家乡。我在一九二七年离开家乡之后，就立志一定要把革命搞成功，将来回到家乡把农村的教育搞上去，把革命的成果送给乡亲。可是，我除了一九四一年带部队在那里打击过日本侵略者和伪军之外，还没有替家乡做一点有利于乡亲的事，直到现在我还眷念着家乡，渴望着为我的家乡安上自来水、设上卫生厕所，多少为乡亲们搞点福利。恐怕这个愿望在我有生之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

二、艰辛的家世

我国农村的行政区域，常以佛道教的庙宇和自然村落划分，樊里堡、连环堡、大东堡、永安堡等，都是庙宇。以它为中心的区域，就以庙宇做了地名。樊里堡一名由来已经渺茫难详了，我出生时这里已经没有樊姓人家了。屠家湾也是座落在两川之间的冲里，全湾不足二十户人家，以屠姓为主。

这里人谈起祖先，都称江西人是老表，大都是从江西迁来的，张、屠两姓也不例外。据屠家说，有一个先人的祖坟迁来时，棺木上还锁着铁链，可能与犯罪有关。先人们从江西跑到孝感，再迁到汉阳的蔡山，没有多少户人家，也没有什么亲戚。

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贫富两极分化，呈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据记载，一个叫高一鹏的，明中叶在四川中江县做了一任知县，下任后买下了周围几十里的小蓼湖。我幼年时，小蓼湖被刘、李、高三大姓霸占水地也基本上是属于他们的，广大贫苦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以租佃为生，每到秋冬之际，常常填不饱肚子，又不得到小蓼湖捕捞，仅能靠挖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藕、芦根充饥。

我们张家是小姓人家，无据可考，也无甚族谱留传。我童年的时候，只从祖宗牌位上知道曾祖叫张光×。曾祖一代兄弟三人，只长兄一门生了祖父张明昌其他曾叔祖两支，一支无后，一支无男，只生一女。我只在幼时见过一位叔曾祖母，其他人都没见过面。

祖父张明昌家境贫寒，没有土地，为人佣作，死得很早。祖父生二男，即我的父亲张勤松、叔父张勤柏。祖母带着两个孤儿生活极其艰辛，在我父亲八、九岁时，祖母便把他送给人家放牛，她自己带着我的叔父去汉口给人帮工。祖母一般是在商人家做帮工，有几个月为了多赚一点钱，也曾在一家“半开门”的窑子里帮工，为此，我父亲一直对祖母不高兴，甚至有一个时期不来往，祖母以后还是到普通人家做帮工，同时让我叔父在汉口学裁缝。到叔父十五、六岁的时候，祖母要他辞了别人的工，自己揽活干，开起裁缝作坊来。后来，祖母又帮叔父成了家，但他积劳成疾，得了肺病，早逝，遗有一子，名张汗卿，就是我的堂兄。堂兄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基本上是依靠我父亲的帮助，在乡下读私塾，直到十四、五岁时才去武汉一家出售五金材料的铁号当学徒，以后当店员，解放后在武汉地方管的一个集体铁工厂当保管；堂嫂是家庭妇女。堂兄堂嫂都不过问政治，只因我是共产党、新四军，才对我党、我军表示同情。祖母一直在武汉过活，父亲曾一再催她返乡，她都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过去对大儿子（指我父亲）没有尽到抚养责任，所以晚年也不愿意依赖他生活。直到我因参加革命被国民党下狱，父亲因此服毒自杀之后，她才回到乡间，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不久，也就因年老伤心，病故在乡间了。

我父亲在十几岁以前，一直都是生活在农村，因为家庭贫困，无力婚娶，后经媒妁(不知我父亲家很穷)，才订亲于我母甘氏。母本姓杨，早年丧父，随母嫁到甘家，为甘家养育成人，在

甘家又有三弟二妹，相处极为亲近、和睦，所以母亲生前不肯嫁她姐杨，说杨家没有养育过她，愿为甘家女。后来父亲的贫困情况为甘家所知，曾几次要求退婚，都没有退成。

父亲当时的生活很没有保障，给别人帮活，有时还帮不上。他喜欢搞些练武术呀、气功呀、什么的。为练刀砍不入的气功，他曾经上过别人的当。有一次，他运好了气让别人拿铁锤子打他，可是没等他运好气，那人就一锤子打下去了，父亲受了伤，以后才不练气功了。父亲还爱打抱不平，年轻时头上有几根白发，别人称他为“白毛大爹”，表示他有横劲儿。我小时候在农村同别人打架，别人没办法了，就说：“算了，别理他，他是‘红毛大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家忽然发了点小财，财虽不大生活却有了指望。

我的两个叔曾祖，每家都有十多亩田地，又都没有儿子，绝了代。他们过世后，只留下一个姓周的续弦曾祖母，年纪很大，无法生活，所以两家叔曾祖的土地都交过来，归我父亲和叔父俩兄弟继承。叔父在汉口做裁缝，又早逝，祖父辈三房共有的二十亩田地，便都由我父亲在家经营。这二十多亩田地，在我们当地的农村来说就不是小数了。

父亲聪敏好学，喜交游，但不善治家业，他卖了部份田产，开办糟坊（酿酒），购置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样兵器，铺垫场地，练习武艺。每日有拳师、武术师济济一堂，习拳练武饮酒。日复一日，家业逐渐破败。父亲自觉难见乡里父老，便把剩下的几亩地（只有三分水田，其他多是旱地，一般只能种麦）交给了我母亲，只身跑到武汉去了。

父亲在武汉，开始是给人家当小工，以后上了轮船帮工，得到船主人的赏识，提升做了水手，他勤奋好学，慢慢成了三付，二付、大付、“临江”（长江一带称领港为临江），因此长江经

过湖北境内，一直到湖南洞庭湖，那些水路和暗礁、桥梁，他都很熟悉。在他船上还有个号叫"松亭"。开始时，轮船工人工资很少，都是靠从宜昌或常德地方上带点鸦片土到武汉来，有时被禁烟土的人抄走了，就落得个财货两空。父亲的一点微薄的工资，除了他自己生活外，根本不能拿去养家。贩鸦片土有了钱，他就胡花乱花，有时母亲找到武汉向他要钱，他也不理，母亲便同他吵架直到生了我，有了儿子，他才回心转意，想顾家了，可是又失业了。

记得有一次父亲两手空空从武汉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织布，一见不顾家小的父亲，气得立即让刚刚四、五岁的我拿棍子把父亲赶出家门，我一面拿起扫把挥动着，一面向父亲嚷着："你没有养我们！"父亲说了许多好话，发誓以后有了工作一定顾家，争执了好久，母亲才让我放父亲进家。父亲看到织布机，看到劳累过度的母亲，看到瘦弱的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这才决心今后量入俭用，养育家室。

父亲在家住了几天，又回到汉口，找到了工作，从此他果然把微薄的工资分一部份给家里养家了。父亲每月要给家里一、二十元钱，这在当时足以维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再加上我那位叔曾祖母和母亲的勤劳，我才有了入私塾读书的条件。

在我记忆里，清晰地留下了曾祖母纺线、母亲日夜织布的情景。幼小时我常常拿着书本凑在灯油下，一面读书，一面陪伴着母亲，也常常在寒冷的冬夜，睡梦朦胧中，听到母亲的机杼声。这扎扎的机杼声，在幼小的我听来，是何等的亲切呀！它能把深沉的母爱，点点滴滴地倾注在我的心头，滋润着我的心田。待到天明，母亲便赶到集市上，卖掉自己织的布匆回来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农村的家织布就有了市场。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结束，洋线、洋布来了，农村的土布就卖不出去，纺织机都闲下来了。这时，又全靠我父亲的工

贷来的租田，不足的部份，就靠母亲在几亩土地上勤劳苦干的收获，每年收麦子十多担，一部份吃，一部份卖给农村的糟坊做酒，我们可以换点细粮吃。主粮全靠田里的生产，每年可以收三百斤谷，其他是大麦、小麦；母亲在田边地角种点丝瓜、豆角之类作为小菜，等到父亲带回钱来，才能卖稻米。米是米贩子定期送上门来，或者由我们去取。我们还可以在肉铺子里起个折子（记帐薄），每次割四两、半斤、一斤肉，都记在帐上，一起算帐，一年分三季给钱，肉铺肉贩子还争着包主顾。

在我记忆中，家里从没有吃过什么好饭菜。吃饭时桌上经常只有一点咸菜或豆豉。那时同别人开玩笑，经常说："你回去吃碗油盐饭！"说明当时油盐都很贵重，炒过的油盐饭就是难得的好饭食。

我家的亲属，都是贫苦农民或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土地极少。我家的田地本来不多，后又分成了我和堂兄两份。到我因参加革命被国民党下狱之后，母亲又多方奔走，卖田以赎法官，剩下的很少土地就送给堂兄了，土改时堂兄险些被划成地主，因为他不在家，才被划成了小土地出租者。

三、乡塾里传来新思潮

我从七岁开始读私塾，启蒙老师是离我们村半华里远的王湾的一个小地主分子，名叫王天喜。当时，他已有六十岁左右，据说他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取，自家有几十亩土地，雇人耕种，自己家里人也帮助劳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不劳动。他娶有两个老婆，都未生育。王天喜为人迂腐糊涂，教书只是为了排解寂寞。二十多个蒙童，大多数是他王家的子弟，我们村和我们村后的一房湾，总共只有几个孩子去读。他很袒护王家子弟，有一次，请他去给刘家的孩子举行结婚古礼，他为了培养王家的孩子，就要一个姓王的孩子去读古礼文章；那个学生

不知被教了多少遍，我们都背熟了，他还是背不出，这个孩子只会按用过的文章念："本音王氏门中，历代宗祖神位……"，我提意见说："人家姓刘，你怎么还念王？"他说："老师就是这样教的！"老师在一旁厉声吓斥我："就是你知道！插什么嘴！不许你去人家。"后来他们去了怎样念，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从武汉送叔叔回来养病，带回很多梨，我就提十几个送给老师，老师一见非常高兴，对我说："告诉你爸爸，你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你的天赋很好。"当时，他就把"论语"拿出来给我讲解："子击磬"，是说夫子击磬。他还指给我看神龛上的铜磬，其实，孔夫子敲的应该是石磬。他教的课，我第二遍就能背下来，老师非常高兴。我在那里读了二、三年，十岁左右读完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又读了"诗经"，老师从来不讲，只是带着念。我已经能背了，但不理解意思。王老师自己无子女，对孩子要求不严，父亲觉得他对学生不严厉，又糊涂，怕耽误了我；我自己也不愿意在这里念了，于是就改送我到我家附近的另一个村子——袁家七头新设立的私塾里去了。

这个私塾里的老师名叫刘魁国，是一个以管教学生严格闻名的人，时常打学生，家长还称赞他。他每天早晨到集镇上去坐茶馆（在那里替人排解纠纷，吃过早点才回到学堂，检查学生谁犯了规矩、谁没读书。他要求学生背书，背不出的就罚跪。我都能背出，所以基本上没有跪过。他也选一些他理解的给我们讲，其他可能他也不理解，所以不讲。在两个老师那里，我学的都是古董，我一直从"三字经"、"四书"、"诗经"、"左传"，读到"书经"、"易经"等等，都能背诵，但不知其内容，可以说是只认识了字，连封信都写不出来，我对这样的学习丧失了兴趣。有一次老师外出，回来时我没发现，正和一个同学争吵，被老师看见了，他骂我，我生了气，就装着上厕所跑掉了，家里人找到我，妈妈把我送回学校，要老师别再打我，老师答应了，可

是我却决意不再在那里读书了。老师说我破坏了学规，不读也要打一顿，说着就打了一顿。一气之下我便跑到武汉去找父亲。

我恳求父亲把我留在轮船上当学徒，他不答应，只同意我到武汉的商店去当学徒。父亲觉得自己在水上生活很辛苦，风险也很大，他羡慕商家的“站柜台”生活，既清闲、又无风险，但我却不愿意干。一次，他托人把我带到一家汉阳人开的布店，店东同意了我去当学徒，让我第二天拿铺盖去上工，而我却在第二天返回乡间，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带信给我母亲，仍要我继续读私塾。

在前两位塾师那里只学会了背书上的文字，对书上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其好处是使我没有受这些书里所宣扬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但使我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听人讲“侠客”、“剑客”一类的故事，十岁以后，我自己也购买这些书看，立志要当一名“侠客”或“剑客”，长大以后去“劫富济贫”，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甚至同几个较大的孩子约好将来一起去峨嵋山、茅山学法，去武当山、少林寺学武功，以便学成本领，成为“侠客”或“剑客”。至于这些山和寺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远的路程，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凭空说说而已。

回到乡下，大约十三、四岁时，一房湾新设了一个私塾，塾师叫吴品山，是附近人，地主子弟。吴曾在武汉读过中学，这时也只有二十多岁，我便转到他那儿去读书了。吴教我读古文，给我“开讲”，并要我学作“论说”文，这又重新提起了我对读书的兴趣。在当时的乡间，吴是一个有点新思想的人，有些在武汉中学读书的乡村青年，返乡之后也常去找吴聊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世界有“列强”英、日、美、德、意、俄，都是欺负我们的；中国有“军阀”，是“列强”的走狗；也知道有个孙文，人称孙大炮，有什么“革命派”、国民党、“过激派”（他们称我党为过激派），都在广东闹革命，中国要强盛，就要靠学

生起来爱国等等。我原来一心只想劫富济贫，做侠客，偷着看些《七侠武义》、《济公传》一类的书，听他们讲这些道理，觉得很新奇。他们还传来一些进步书籍，记得我曾偷看过一本大概是叫作《欧洲旅游记》的书，讲各国强盛、中国衰败的原因，那书传到我手里时，连封面都没有了。好在这时我便开始向往着能做一个“救国救民”的革命党人，设法去上军官学校或当兵，以便将来能打仗“救国救民”。我还偷着读过《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书，似懂非懂；也看一些言情小说，包笑天的、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一类乱七八糟的小说，对我那时的思想影响都很大。目睹父亲在水上的生活也开拓了我的眼界，水手们豪迈爽快，不吝惜钱财，对我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当时，只知道是学生运动，闹罢课，从武汉跑回乡的学生说：“学生同日本人打仗了，开始时学生打了胜仗，以后又失败了。”我很瞧不起这些从武汉跑回来的学生逃兵，我想，我如果在城里读书，一定会同爱国学生一起战斗；我又想去当兵，扛枪打日本人。我对日本和英国侵略者都很仇恨，我在武汉的租界里，经常看到他们趾高气昂的神气。我也看到爱国学生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拒绝日货和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行动。学生们把爱国口号、把“二十一条”印刷到扇面上卖，我还买过这样的扇面。我也从塾师那里拿来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一些反日书籍来读，使我开始有了爱国主义和“救国救民”的初步觉悟。这样，我又自认为懂得的事情很多，自负起来；加上我是一个独子（我虽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但当时重男轻女，是不把女儿当自己家里人的），娇生惯养，更加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于是就渐渐瞧不起这个青年塾师了。实际上，这个塾师懂得的东西也不多，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六、七年了，他当时还不知道，还在那里说侵略我国的“列强”有“东日、西英、南

法、北俄”；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还不知道，只知道有个“过激派”。而我知道的东西就更少了，却还自高自大，可见自己当时的思想是多么幼稚。

父母让我读私塾，本是想培养我做乡村私塾教员的，我却不安于这种学习，要求去武汉进“学堂”读书。进学堂费用很大，父母负担不起，于是就折中一下，让我到离家二里多地的一个私塾去读书了。这里的塾师名叫甘绍之，是一个长期在外地教书的“才子”，写得一笔好字，文笔也不错，又是我母亲养父家的族人，排行第三，母亲要我称他为“三舅父”。据他自己说，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同盟会”，做过一些衙门的幕僚，不拘小节，很少瞧得起什么人。此时失业返乡，人慕其名，便集中乡村一些准备将来当塾师的青年，请他设馆任教。总共学生只有十名左右，多是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儿子，只有我一个人是工人的儿子。这些乡间青年都认为比我家富有，瞧不起我，但我比他们能多背古文，写文章也比他们快，比他们好，他们背书背不下来总要挨打，我呢，千把字的文章读两遍就会背了，被人称为“神童”，我因而也就瞧不起他们。当时，同我比较接近玩得好些的是万流一（现任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甘绍之吸食鸦片，白天睡觉，夜间才去讲课。正好万流一做了私塾教师，白天教书，夜间就去听课。我同其他同学都不大接近，自己觉得不如他们富有，不满意他们，也渐渐觉得同劳动人民不同了，成了一个所谓的“读书人”了。可以看出，旧的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这种烙印，还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在革命的洪流里，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才渐渐去掉的。

在先前几个塾师那里读书，学费都很少，一年三季，每季大约合银元三、四元，在自己家里吃饭，不掏饭费；现在在这个私塾里读书便不同了，每季须交学费十元左右，每月还需要拿三元左右的伙食费。父母省吃俭用才能供给我的费用，我因此很用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